

1 导 言

1.1 研究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时期。1950~1955年，妇女的年均总和生育率为6.2，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41岁，年平均人口粗出生率为45.4‰，粗死亡率为24.4‰，年自然增长率为2.1%。1965~1970年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继续上升至2.55%^①。

从本世纪50年代起，一些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人口增长的经济后果问题。科尔(Ansley Coale)和胡佛(Edgar Hoover)1958年对墨西哥和印度的案例研究被认为是当时的代表作，该项研究认为：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快速的人口增长具有严重而消极的经济后果；降低人口增长率可以有效地促进人均收入的增长。50年代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限制人口的增长。1952年印度成为第一个制定人口控制政策的发展中国家。

随着人口增长的加快，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拉大，人们愈益清醒地认识到，人口过速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制约因素，人口控制是摆脱落后状况，实现经济起飞的有效途径。为促进经济发展而控制人口，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认识，人口政策逐渐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80年代以后，人口增长方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但各人口要素变动的方向和程度差异很大。到1984年墨西哥城世界人口会议召开之时，仍有占世界人口1/4的国家生育率没有下降迹象，政府也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大多数是非洲和拉美国家，它们是世界

① 联合国“1985年世界人口预测方案”第144页。

上最穷的一些国家，也是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与之相反，一些政府因为妥善地处理了人口控制与经济的关系，促进了经济的顺利起飞。例如，日本、泰国、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两类国家人口发展的差距主要根源于政府对人口控制的态度上 前者采取不支持 或者不积极的态度 后者则态度积极 政策明确。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首先，不能坐等经济发展带动人口下降。因为最初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下降的效应，而不是相反。其次，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走由个体生育行为转变导致生育率自发下降的人口控制道路，这是一条既漫长又痛苦的道路。从本质上讲，任何生育行为的变化都是在客观环境的压力下完成的，在这其中要经过人口增长与经济反复适应和调整。人类要在认识和掌握这一客观规律中付出巨大的代价，贫困家庭和贫困妇女付出的代价最大。因此，有意识的生育控制是人类基于对客观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之上的一种明智选择。再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这种潜力一是来自医疗技术和生活环境改进所导致的死亡率下降效应；二是来自初期的经济发展所引起的人口增长容量的扩张。对此，唯有强有力的外部干预才能消除出生率与死亡率变化的差距，抑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不良影响。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承担这一重任是责无旁贷的。

中国的人口发展和人口控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佐证。解放后至 70 年代初期，中国是一个以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为特征的过渡型人口增长模式，从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人口迅速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三低”模式转化。经典理论认为 人口转变是社会转变的结果。换言之，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传统人口增长模式必然要向现代模式转变，这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过程。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却不完全经济转变的伴生物，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控制的结果，与强有力的口控制政策和计划生育项目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中国的实践证明，如果在人口发展过程中，增

加一种新的变量——政府的人口政策和人口项目，人口转变会在速度上加快，在程度上提高。同时，人口转变也可不以社会经济转变为前提 而是与它相伴随 或者超越它 为它开路。这种实践在其他国家不是没有先河，但中国的特色更强一些，因为我们具备一些独特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

国内学术界对人口控制中政府行为和作用有不同的见解，比较对立的两种观点是：一种认为经济体制转变以后，市场应该取代政府成为人口调节的主导机制，主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逐步放松甚至放弃对人口的干预；另一种认为中国的人口控制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与经济体制无关，人口变动不能由市场调节。换言之，政府可以继续独立于市场经济运行之外对人口进行控制。显然，两种观点都缺乏理论根据，前者是把市场经济作为唯一的人口调控机制，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可取的；后者把市场经济、人口控制和政府的作用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在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中也是有害的。造成混乱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分清政府职能一般与政府特殊的人口控制职能；把政府的内在职能与现实中一些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混淆了；把政府的职能和行为等同于现行的人口政策和特定的人口项目，这些都需要深层次的理论探讨。

1.2 主要内容

本研究包括三项主要内容：

第一，从理论上阐述政府干预人口运行，调控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目前国际人口学界开始对传统人口经济增长理论提出异议，认为不能过高评价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许多情况下，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不直接产生影响，而要依赖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一些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一国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没有什么统计上的联系”，而人口政策的干预对改变人类的生育行为，调节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有显著成效，“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人类行

为和人类体制发挥关键的调节作用”。这些观点是对传统人口理论的挑战，然而却没有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总是表现为经济问题；为什么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依靠市场机制和单纯的经济增长，难以解决人口增长与经济矛盾的矛盾，而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

人口控制研究的核心是政府人口控制职能和行为研究，只有把人口控制上升到政府层次，才能说明一些本质性的问题；也只有从政府职能的角度，也才能解释当代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的特征。由此涉及到对一些深层理论的思考，包括：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政府职能一般与发展中国家人口调控职能的特殊性，以及政府人口调控的背景条件、方式途径等。一般来讲 政府介入的人口问题 主要是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控制，在当今社会，只有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才存在这种必要。这些国家面临着经济起飞、体制转轨等多重社会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对它们来说，过大的人口规模和过快的人口增长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按照西方的经验，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生育率可以自发转变。换言之，市场机制可以调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终解决人口增长问题。但是，西方经验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及时寻找新的途径，就会永远落在发达国家的后面，无法摆脱强者恒强 弱者恒弱的发展格局。因此 对落后国家来说，可以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但必须依靠政府机制解决资源的适度规模问题，人口控制主要是规模问题，适度规模是适度配置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论述政府按照什么原则、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条件下进行人口控制。在人口控制问题上，发挥政府的作用已成为一种共识。这不仅因为人口控制对一些国家的经济起飞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从理论上讲，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通过政府的力量，制定严格有效的人口政策，实施大的人口控制项目，例如计划生育和生育健康等项目，确实具有见效快、

效益高的特点。这就像一些大的基础设施、水利工程和农业开发工程的组织一样，与自发的个体行为相比，政府行为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政府通过政策导向、宣传媒介、技术推广甚至强制性措施等多种手段，能够及时、有效地达到预期的人口目标。因为通过政府的力量，可以建立多种行为规范和行为机制，有效地约束人口的生育行为，促进传统生育行为的转化，达到预定的人口控制目标。政府力量对个体人口行为的约束力和有效性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需要深层的理论剖析。

从另一方面讲，政府的干预不一定正确，更不一定完全有效。与“市场失效”一样，“政府失效”也在所难免。我国目前许多人口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政府失效”造成的，应该进行客观地分析，特别是对一些制度安排不合理造成的问题，一定要通过规范制度，规范政府的行为，完善政策实施体系加以解决。以往对这些问题，我们过多地去寻找某一届政府及其主要决策者的主观责任，实际上任何政府的行为、政府的决策以及政府的“失败”都具有客观必然性。科学研究目的是指出“政府失败”的原因、机制及其后果，挖掘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第三，对我国解放以来人口控制与政府行为作出理论和实践的总结，总结中国政府控制人口增长的经验，或者说概括出一个中国的模式。从总体上讲，近 20 年，中国人口控制的实践是成功的；政府所采取的人口控制模式是值得总结的；中国在人口控制中所走过的弯路、付出的代价也应该作出客观评价。因此概括出“中国的人口控制模式”，追寻这一模式发展和演变的历程，展望它对我国未来和世界发展的影响，是一项艰巨，但很有意义的工作。

时代需要我们探索一种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和发展环境的人口控制理论。应该承认，西方理论的引进对中国的人口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发展经济学为我国人口经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新家庭经济学对体制转轨后新人口问题的研究做了理论准备；西方人口政治学的兴起对解释人口控制中的政府

行为更有启发作用。但是，这些理论对中国的人口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西方规范的理论研究，是以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实证研究又多是西方经验的总结，是与我国完全不同的环境的产物。我国是一个长期受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的国家，目前虽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但是从发展水平上讲，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况且我们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就需要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人口控制与政府行为作出理性的，联系实际的研究。

人口对策从来就是人口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我国的人口对策研究则比较薄弱：一是缺乏系统的人口对策理论研究；二是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不够，特别是在对中国人口控制方式和途径的研究上，有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一方面陷入纯学术之争的“怪圈”难以自拔，另一方面将理论的研究成果束之高阁，不予理睬。如何从一种新的视角，吸取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当前的人口控制问题，是摆脱困境的希望所在。如果在传统人口学和人口政策学的基础上，吸收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社会哲学的一些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人口控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将会有新的解释和发现。有助于把研究重点逐渐转到对人口行为，包括政府的人口控制行为和个体节育行为的探讨，不再拘泥于对客观过程的描述和预期结果的判断，使研究更有意义，与现实更贴近。

1.3 研究意义

人口控制中的政府行为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相对而言，其理论意义更不容忽视，许多实践中的问题有待理论上的澄清，对我国来讲更是如此。中国当前人口控制的难点很大程度不是告诉群众怎样办，而是解决政府如何办的问题。经过十余年的计划生育运动，广大群众已经基本摆脱了生育的盲目状态，开始进入有节制的生育，尽管他们的行为还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

限制，仅是一种有限的理性行为。这种有限理性一方面表现为，某些个体的生育行为还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某些群众的生育行为与政府的人口控制目标仍有差距，原因主要不是缺乏避孕手段，而是不情愿接受政府的生育政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愈益突出，是政府人口控制的深层障碍。

体制转轨以前，人口政策在人口控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有效地抑制了人口的高速增长。成效的取得有一些特定的基础条件：例如，群众有控制生育的内在要求，特别是有发展经济、提高收入的渴望；人口管理的组织系统健全，行政约束力较强；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统一的刚性政策有实施的空间。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微观人口下降的潜力接近极限，并日益显示出负效应，而生育控制的正效应却不一定与个体收入成正比例变化；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促进了群众自我决策能力的加强，对政府和集体的依赖力减弱，与集体目标的对抗意识加大。这种现象本质上反映了传统人口控制机制与市场经济机制的内在矛盾。如何在社会经济转型期间，继续依赖国家意志的权威性和发挥政府这一特定组织形式，协调好生育问题上个人、集体和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以期达到政府人口控制目标，是一个理论性和政策性很强的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中国的人口控制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原有的“以行政直接干预和微观数量控制为主”的传统模式逐渐失去了效力，一些从事人口控制的政府工作人员开始抱怨市场经济体制干扰了我们传统的人口控制系统，抱怨群众不再买我们的账，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思想。反过来思考一下，在人口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变化的情况下，人口运行主体的行为和人口控制主体的行为都必然要改变。后者应随前者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无论是从特定历史时期考虑，还是从中国人口问题和外部因素的复杂性来考虑，对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人口控制中政府职能和行为的系统研究，都是非常必要和适

时的。

在未来 20~30 年内，我们还要继续奉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政府还要承担控制人口的职责，政府的人口控制行为将最终决定着人口控制目标能否实现，决定着中国能否在 21 世纪前彻底甩掉沉重的“人口包袱”，走上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路。因此，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冷静地分析当前的人口形势，客观地评价政府行为，理智地制定未来的行动方案，是非常必要的。

1.4 篇章结构与研究特点

本研究以中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为背景，主要从人口经济学和人口政治学的角度研究人口控制与政府行为的关系。全书由一般理论探讨、国外案例比较和中国问题研究三大部分组成，从理论阐述入手，进入实例比较研究，最后落脚在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上。总体遵循从一般到特殊，从基本概念到主要观点，从抽象理论到具体实际的研究逻辑。

理论部分首先从人口政治学的角度论述了人口控制职能是政府的基本职能，然后由人口经济学的角度说明政府调控人口运行主要是为了解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国家利益优先和社会福利最大的基本原则。最后论述了政府进行人口调控所遵循的原则、借助的手段和选择的方式等。

案例分析建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和国内不同时期的人口控制与政府行为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的目的是说明政府行为是解决国家整体人口问题，取得人口控制效果的关键。国外研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为背景，首先以发展中国家整体为对象，介绍了“二战”以后各国政府对人口问题的基本态度及其转变过程；而后对三个亚洲国家政府人口控制的行为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一些有理论价值的结论，为中国问题的分析做了铺垫。

对中国问题探讨的思路是，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两大部分，前

一部分主要是对传统体制下政府人口控制模式的分析，后一部分重点是对体制改革模式的探讨。对计划体制下政府人口控制行为的分析，主要是揭示由于体制的因素，政府的人口控制职能如何被异化，经济运行对人口控制的内在需求怎样通过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体制改革后的分析，围绕着在改革和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政府的人口控制职能如何发挥作用，又如何协调两个人口转变与两个经济转变的关系。因为我国的人口控制早于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又先于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所以将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过程作为政府人口控制的宏观大背景；核心分析政府行为与“两个转变”的关系，即人口增长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人口控制模式和经济体制转变的关系。将这些问题论述清楚，也就掌握了对中国人口控制研究的基本脉络。本项研究力争在以下方面创出新意：

(1) 对中国人口控制的历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大致的把握。当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积极探索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之路，总结中国发展模式的时候，人口学者也应该对中国的人口控制作出理论与实践的总结，这是中国学者的职责，也是本书写作的动因所在。从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看，主要从三个角度对政府人口控制行为进行研究：第一种，对国别之间和不同时期人口政策的形成特点、演变过程和作用后果进行比较研究；第二种，运用多因素模型分析，将政策作为其中一个变量，分析它对人口变化的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第三种，从政治学的角度比较政府人口决策的方式、决策的基础以及政策的实施后果等等。前两种基本是人口政策研究；第三种研究范示带有机制研究和理论分析的性质，但侧重对一般规律性的揭示上，忽略了对不同国家经济、人口和制度三者之间关系的特性比较，对分析中国问题有很大的局限性。

(2) 为了突破传统的以描述和比较为主的研究模式，试图借助人口政治学的思路，运用人口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探讨人口控制与政府行为内在关系

的理论体系。不局限在政策分析上，把政府行为分析与人口运行分析结合在一起，将整个研究置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中，逐层地分析政府人口控制职能的产生条件、运作方式、运行机制以及运作后果。这种分析角度较好地处理了由政府人口职能共性所决定的一般运作过程，与特定环境下政府运作行为特性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容易将一些凌乱的要素和纷纭的现象梳理清楚，有助于进行机制性和规律性的剖析。因此，将本项研究的重点定位在对以下问题的探讨上：

其一，对政府人口控制职能和控制行为的理论探讨。将政府人口控制行为与国家性质和政府职能分析结合起来，深入挖掘政府人口控制的目的、动机及其产生的制度性原因；在此基础上，界定了政府人口控制职能和控制行为的内涵，指出职能是内在的或隐含的，行为是外在的，需要借助法律、政策、项目等手段表现出来，这种区分可以解释现实中为什么会出现政府调控行为偏离调控职能的现象；此外，特别强调政府对人口过程的干预不是无条件和无限界的，而是有条件和有限界的。其中，人口控制的目标和手段选择、外部环境的配合以及政府自身行为的规范等，都是决定政府调控成败的关键因素。

其二，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政府人口控制与经济的关系，即结合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来研究政府人口控制行为。通过对我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分析表明，人口问题解决的关键是政府能否将人口控制纳入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政府计划代表着政府干预公共事物的意志，代表着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动向和配置方式，它具有客观必然性，又受到决策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政府为什么在特定时期采取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人口政策，为什么人口政策总是随着政府的政治经济行为变化，与政府对人口问题的认知程度和干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对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找到了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就找到了人口政策的运行轨迹。凡是进行人口控制的国家，都企图依靠政府机制解决规模问题，都把

人口增长作为规模不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实践证明，与市场机制相比，政府机制对此确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其三，客观地分析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控制方式的形成过程和运行特点，对传统体制下人口问题的性质和决定因素进行理论剖析。指出，以往在分析传统体制下中国人口问题的产生时，总是把政府主观决策失误作为根本原因，本项研究认为，虽然“政府失误”是问题的根源，但主要不是政府的错误行为，而是传统体制造成了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位。当国家用政治职能取代一切职能时，人口调控职能不可能正常发挥作用，政府行为的扭曲也具有客观性，其结果，必然造成人口与社会经济运行不协调，导致人口问题的产生。

(3)把对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人口控制行为的评价作为研究的落脚点。该时期政府的人口控制颇有成效，也有失误。成效主要得益于三方面：一是政府的介入适时，二是控制力度大，三是组织严格；主要的成效是人口控制为政府创造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配合了“软着陆”改革方案的实施，值得肯定。主要的失误是政府的人口控制目标过于理想化，控制行为有些偏激过急。通过对 90 年代以后人口问题的新特点和原因分析，特别强调人口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不能长期处在“双轨制”状态下，其不良影响已经显露，今后的任务是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人口控制模式，政府的人口控制行为也需要依据政府职能的转变得到规范和优化。

总之，中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一样，其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比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可能用一张答卷解释所有的问题，哪怕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所能做得只是发现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对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新的解释；用新的方法去探讨一些尚未被关注的问题；以及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些新的对策思路，等等，如果能在这些方面做出努力，就实现了研究的初衷。

2 已有研究的回顾与评价

人口控制学说，是人口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史以来，人口问题就始终为统治者所关注，随着社会的变迁，人口控制成为现代国家及其代表者政府的基本职责。虽然早期由资源、财富贫乏所导致的人口过剩问题常常困扰人类，但是问题的性质一般是局部和暂时的，没有引起统治者的特别关注，也没有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政策主张。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更关心人口规模对增强国力的作用，纷纷制定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扭转了以人口规模论国力的传统信念，人口过快增长阻碍社会进步的现实，也迫使一些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控制人口增长。

从一般意义上讲，人口控制是指政府对人口运行的干预和调节，包括对一个增长着人口的抑制，也包括对一个下降着人口的刺激，狭义上的人口控制主要是对人口规模和增长的限制。对人口控制研究也分为两种，一种是狭义的人口控制理论，主要是研究人类增殖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问题，探讨在既定的目标之下，如何通过限制人口总量增加，调整人口内部结构，以适应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广义的人口控制理论，或称人口调控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单包括限制人口的增长，还包括刺激人口的增长和促进人口的发展，以协调人口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为避免概念内涵界定的不统一，本文遵循如下论述原则：对一般理论的论述，按照广义的对人口控制的界定，人口控制包括政府对人口运行的所有干预行为；对实际问题的论述，特别是对一些人口增长问题较为严重国家的政府行为的分析，遵循狭义的界定，这意味着，在抑制人口增长已经成为政府目标的前提之下，集中分析人口控制的必要性、控制主体的确定和控制方式的选择等一些深层问题。

以往与政府行为有关的人口控制思想，依据控制方式和控制机制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张由国家直接干预人口增长；

另一类是主张国家通过经济和社会机制间接调节人口的增长。实际上,前者主张由国家来制定和实施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后者不主张国家实施直接的人口政策,但不排除用其他的政策和机制对人口施加影响。目前对立的两派虽有调和的趋向,但争执远未结束。正是对政府在人口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核心问题的论争,分成不同的理论派别,引出学说发展和演变的轨迹。

2.1 古希腊的国家人口控制思想

人口控制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思想家,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代表。他们是主张对人口进行国家干预的最初倡导者和思想先驱,尽管一些政策主张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在许多方面很有价值。

2.1.1 建立在‘国家核心论’基础之上的人口控制思想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主张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和由国家来控制人口,其目的是为了国家生存和稳定的政治需要。他们的人口控制思想,带有明显的政治、伦理色彩,强烈地体现了“国家核心论”和“国家至上论”的思想。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社会秩序稳定和平的理想国,在这个国家里,一切社会、经济和生育活动都成为国家运行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服从于统治阶级旨意,服从于国家强大、有序的根本目标。在柏拉图的晚年著作《法律》中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国家强制性的经济政策控制人口的思想。例如他主张平分土地,按照土地的数量配置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如果人口数量超过了土地的需求,国家就强制减少生育或向外移民,当人口缩减时,采取相反的政策刺激人口增加。

亚里士多德的人口控制思想与柏拉图极为相近。他认为一个城市国家的协调有序要依靠平等的法制,而平等的条件是对人

口的限制为基础。因为土地是有限的，所以市民的出生数量不能超过土地的限制，否则，城市国家就会发生危机。古希腊所承认的人口是法律承认的市民人口，不包括奴隶等，人口控制也是对拥有一定的财富支配权和享有国家财富分配权的市民数量的控制。

2.1.2 古希腊人口控制思想的主要特点

(1) 控制人口规模的思想表现的极为强烈，这是由当时古希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古希腊是一个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上的奴隶制城邦之国，小国寡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它必须保证土地的完整和相对平均分配，以保证人口增长与不可扩张的土地面积之间的静止平衡。否则人口的盲目增长必然形成与生产和生活资料之间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城邦国的灭亡，人口规模是国家控制的核心。

(2) 主张国家对人口增长的强烈干预。人口控制的宗旨就是为了国家的存亡，个人对生育没有选择的权利，个人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国家生存和统治者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国民能否结婚、何时结婚、和谁结婚、能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几个以及生育的孩子能否生存、如何抚养等都必须有严格的限制和明确的规定。这一思想是当时客观实际的反映，古希腊的许多城邦国，人口控制已成为一种社会性行为，个人的生育行为已由国家行为所取代。

(3) 提倡“防御性”的人口控制方式。“自发性限制”主要是指当时自然灾害和战争造成的人口死亡，客观上限制了人口的增长。但是古希腊思想家也提出许多防御性限制人口增长的思想，例如生育控制、优生、重视婚配质量等，很有价值，对现代人口理论也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1.3 国家人口控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引发的思考

从古希腊的人口控制思想中，可以挖掘出一些古代国家人口控制的特征。虽然从深层意义上讲，古希腊的人口问题还是人口增

长与资源匮乏的矛盾，根源于狭小的领土、落后的生产力、残酷的奴隶制度不足以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但是对人口控制的直接目的是基于奴隶制国家政治、军事统治的需要。统治者把人口的增加看作是对有限资源占有的一种威胁，为了实现统治的目的，就要依靠国家的权力，运用强制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增长）有所限制。”^① 适度的人口规模是城邦国家稳定的基础，是政治统治的需要。

古希腊的思想家把维持小城市国家的秩序与和平作为追求的理想，他们主张适度地发展本国的人口，满足封闭的奴隶制城邦国家的特殊需要，将人口政策作为特定治国政策的组成部分。但是同时代的许多国家，因为不存在控制人口的客观要求，增殖人口仍然是国家统治者的政策主张。比较典型的是古罗马。古罗马由于上层社会的荒淫无度，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连年的战争以及当时盛行的独身、堕胎等社会陋习，严重地制约着生育率的提高，人口面临着不断减少的威胁。人口增长无法满足统治者征服他国、扩大本国版图的野心，所以古罗马积极推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希望通过提高生育率来满足侵略战争对人力的需求。

事实证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口政策都是无效的。这两个文明古国最终没有逃脱毁灭的下场。尽管国家灭亡的原因有多种，但是历史证明，尽管可以通过强制的，甚至野蛮的手段来抑制，或者刺激人口增长，但统治者的努力是有极限的。因为人口的发展不单纯取决于自身，还决定于其外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一些奴隶制国家即使存在国家人口调节的需求，没有科学的调节手段和正常的调节机制，统治者的调节愿望也是无法实现的。

2.2 马尔萨斯的人口控制理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人口学说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许多近代人口思想都可以从他的学说中找到理论渊源。鉴于马尔萨斯认定人口增长是社会灾难的根源，主张控制人口，学术界一直将其理论归类在悲观人口学说派系中。这种学派划分的依据是人口增长的结果和人们的主观评价，而非客观的人口运行和人口控制过程本身，因此，将马尔萨斯人口论归属为控制人口增长理论，更为贴切。

2.2.1 近代人口问题的性质及其争论

马尔萨斯理论产生于 18 世纪末的西欧大陆不是偶然的，它是特定人口问题的理论反映。16~19 世纪，西欧各国出现了人口的持续性增长。虽然在 17 世纪曾一度出现了人口增长减慢，甚至负增长的现象，但短期波动之后，人口增长高峰接踵而至。传统的高出生率在工业化的初期没有实质性的转变，死亡率却开始下降，人口增长加剧了工业化国家的人口过剩和贫困问题。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使传统的、以维护封建国家统治者利益为中心的国家人口控制思想失去了市场，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口运行与它的外部环境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应运而生。

最早对人口过剩和贫困问题关注的是一些社会改革家，他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寻找政治经济制度与人口问题之间的联系。例如，孔多塞和葛德文等人认为，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不平等的财产分配制度，人口和贫困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政治制度的变革。葛德文在《论政治正义》一书中反对人口绝对过剩的观点，他认为人口问题产生的关键不在于地球能养活多少人，而在于人生活在什么制度下，私有制造成的不平等是贫困和万恶之源，必须废除。孔多塞在 1794 年出版的《论人类精神进化的过程》一

书，同样认为社会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制度，制度的变革会使一切财富、教育、机遇和性别不平等消失，使人口增长不致因生活资料匮乏而阻滞。在这些社会改革家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人口过剩的根源；控制人口的根本途径在于制度变革。关注人口问题与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的必然联系，是这些思想家的历史贡献，虽然这些政治改良派的方案，具有理想色彩，缺乏可操作性，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批的多，立的少，议论多，实证少，但这些问题的提出挑起了长达百年之久的人口问题大论战，唤起了当权者和社会公众对人口问题的重视，也是马尔萨斯人口论产生的直接诱因。

2.2.2 马尔萨斯人口控制论的主要内容

在西方人口理论中，马尔萨斯主义是人口增长悲观论的代名词，虽然马尔萨斯积极控制人口的思想被充分肯定，但大多忽视了他的另一个理论特点，即极力反对通过制度变革解决人口问题，反对政府对人口的干预，主张通过市场机制和社会伦理双重作用抑制个体生育行为的思想。而我国学术界，却长期纠缠在对马尔萨斯的政治立场和人口对策的批判上，对它的学术价值缺乏历史和客观的评价，严重束缚了我国人口理论的发展。

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包括理论和对策两大部分，理论部分是为了证明多育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主要由三个原理构成：制约原理、增殖原理和均衡原理。三大原理的核心是说明人口与经济的增长之间既有一种平衡发展的要求，又有一种相互背离的趋势，其中人口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界的客观发展规律是决定人口不断增殖的内在机制。对这种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只能抑制，不能忽视，更不能助长，否则就会导致社会性的贫困和灾难的发生。对策部分包括两部分，一是把人口的控制手段分为自然抑制和人为抑制，所谓自然抑制就是战争、瘟疫、饥荒等自然灾害造成人口死亡率上升，人口减少。人为抑制就是所谓的晚婚和